

语言保护刍议*

李宇明

语言保护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语言生活是指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 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 其领域非常广阔, 其地位十分重要。为保证语言生活的健康、丰富和有序, 政府要作出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各种语言规划。当今中国, 乃至世界, 在制订语言规划时都必须考虑语言保护的问题。

语言保护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语言保存, 即把现有的语言和方言的真实面貌保存下来; 第二是语言卫护, 即维护民族共同语和族际交际语的规范, 引导它(它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本文讨论语言保护的意义及其在当前语言生活中的紧迫性, 最后就怎样进行语言保护的问题发表些意见。

1 语言保护的意义

1.1 语言方面的意义

语言保护的意义可以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考虑。先说语言方面的意义。

虽然结构主义者仅把语言看作一个共时的符号系统, 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却可以从这个共时系统中剖析出语言发展演变的年轮。当代的各种方言和民族语言, 都因语言的渐变性和保守性而保存有过去的语言的成分。例如, 今天的一些南方方言, 还保存着双唇鼻音韵尾、塞音入声韵尾和全浊音声母等古汉语的语音成分; “参差、淋漓、弥漫、窈窕、逍遥、蒺藜、逶迤”等已无再生能力的连绵词, 应是远古汉语甚或原始汉藏语的“词汇化石”; “桌子三张、椅子十把”这类记帐式的“名+数量”的结构方式, 保留着古代数量名结构的语序。通过对今天语言的研究和语言(方言)间的对比分析, 可以构拟出不同时代的语言面貌, 并可窥视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

一般情况下语言都是在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中发展的。方言和语言, 记录着它在历史上与其他方言、其他语言相互接触的语言景观。例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 记录着历史上汉语与它们的接触和影响; 汉语中的佛教词和近现代借自西洋和东洋的词语, 记录着汉语同欧美诸语言、同日语的接触和影响; 汉语许多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 则记录着它们受官话等的影响。

方言和语言,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也是推进当今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汉语的发展变化为例, 基础方言规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本面貌, 推动着共同语的发展; 非基础方言则滋润着民族共同语的发育。80年代以来, 现代汉语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 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以及在这些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地方普通话”, 为近十

*此文是出席“香港多语多文化研讨会”(1997年3月, 香港大学)的论文, 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

几年来现代汉语的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代新词新语的产生、外语词的译借、新的句法格式的出现和语体风格的嬗变，有许多都应归功于这些方言。当然，英语、日语等外语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从书面语句子的复杂化、科技词语和广告用语等方面，都可以较明显地看到这些外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1·2 文化方面的意义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独特的方式记录着文化。方言是地域文化（或曰“次文化”）的重要负载者，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综合构成了民族的文化，而且方言及其所负载的地域文化中，蕴含着古代的民族文化的成分，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民族语言是传统民族属性的一种标志，系连着民族的情感，民族语言的地位和命运在一般情况下也体现着或关系着它的民族的地位和命运。民族的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众多的民族语言，代表着众多的文化样式。通过对语言和方言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文化的风貌。

语言和方言不仅是文化和次文化的记录者，而且也是文化和次文化的承继者和传播者。语言和方言的接触，带来文化和次文化之间的接触。不同文化和次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可以推动文化的快速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语言接触史的研究，就是文化接触史的研究。历史的长河淹没了许多文化交往的资料，但是这些淹没的资料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

语言（包括方言）是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化的“化石库”，是语言交往和文化交往的“贮藏室”，而且也是促进今天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语言是财富，语言是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资源。因此，需要对它进行保护。

2 语言保护的紧迫性

2·1 语言和方言正迅速变化

我国是一个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汉语是世界诸语言中方言品种最多的语言，而且我国境内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等五个语系的 60 多种民族语言。但是，应当看到，随着各地、各族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社会生活的变迁越来越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各方言和境内许多民族语言的面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与“五四”运动前后相伯仲。语言的变化不仅迅速出现了一批新的语言成分，而且也必然带来一些语言要素的消失和嬗变。因此，需要把现今的语言和方言面貌保存下来，也需要把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

2·2 一些语言和土语濒临消亡

在方言、语言的相互接触中，一些汉语的土话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消亡。采取紧急措施抢救这些濒临消亡的语言和土语，已是刻不容缓。因为语言不同于其他东西，一旦消亡便不能复活也无法复制，语言消亡也将带来文化、次文化的消亡或“化石化”。

当前, 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物种保护、水土保持、文物保护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社会宣传的力度、采取的保护措施和投入的人力精力都比较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语言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3 母语水平严重滑坡

汉民族的母语水平近些年出现了滑坡现象。从社会用字、店铺命名、书信招贴、街谈巷议等方面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社会的文化含量在急速下降, “语言羞耻心”正在失落。其实, 这种状况在素有“文化殿堂”美誉的高等学府中也是如此。据《文汇报》1995年11月14日载, 有一所国内有名的工科大学曾对该校3511名新入校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了中国语文水平测试, 总平均分仅为63.9, 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写不出一些较常用成语中的字, 如“罄竹难书”、“越俎代庖”、“动辄得咎”中的“罄”、“俎”、“咎”。特别是外语都已有相当水平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其中国语文水平测试的平均分数竟然不及格, 还不如大学生。凡是在高校工作的人大约都相信, 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高校的个别现象, 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母语滑坡的现象,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母语水平滑坡, 有传统上重理轻文观念的潜在作用, 有“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摧残的后遗影响, 有现在的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有大学教育中“文理分家”所酿的苦酒, 但是外语对本土语言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研究生录取、谋职就业、晋职晋级等关系人生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 外语的作用比本土语言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这无形中造成了重外语轻母语的不良文化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下去, 特别是在高级文化人才中蔓延下去, 将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3 语言保护的若干举措

3·1 大力开展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是语言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我国的方言、词汇、语法和民族语言研究者, 在语言调查方面几十年来做了大量工作。数以千计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报告, 出版的各种汉语方言志和民族语言简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和加拿大合作项目《世界的书面语: 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括》(第4卷中国)、贺巍和张振兴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点方言词典)、陈章太和李行健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北方话词汇调查”、于根元和刘一玲等编写的《汉语新词语》及其他一些词典、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描写性研究等, 为保存我国的语言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由于我国的方言和语言非常丰富, 调查任务十分繁重, 这方面的工作量还相当之大。以往的调查主要侧重在语音和词汇等方面, 语法调查相对单薄; 对汉语的一些次方言和土语的研究、对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的研究, 还相当不足。语言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 语言的动态发展也需要及时记录。以往对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研究多注意规范性, 而比较缺乏“记录”的观念, 从语言保存的角度看是有所偏颇的。而且, 双语双方

言（包括多语多方言）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还出现了所谓的“地方普通话”，这是语言调查的新内容。此外，语言的发展变化常受制于人们的语言情感和语言态度，对于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情感和语言态度的调查，是语言调查的深入。

最近，有关单位正拟进行语言国情普查，希望这次普查能够顺利进行，也希望普查的策划者能够充分考虑语言保护问题，尽量加入上述的这些语言调查内容。

3·2 重视双言双语人的培养

当代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是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各地区各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相互接触、相互了解和理解，必须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与合作，以减少分歧、误解和争端，相互促进，携手发展。地区间民族间的接触、交流与合作，必以语言为先导，因此，需要语言沟通（或曰“语言—文化沟通”）。

但是，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语言的沟通往往影响到对语言的保护，过分的不恰当的语言保护则势必影响语言沟通。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决定了必须统筹考虑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问题，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合适的，都会带来社会问题。寻求二者兼顾的语言对策，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项使命。我觉得，造就大批的双言（包括“多言”）双语（包括“多语”）人，是解决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这对矛盾的一种较好途径。

双言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方言的人；双言人所使用的方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言”。双语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双语人所使用的语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语。在获得和使用母言或母语的过程中，双言双语人便把某种方言、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继承下来，并繁衍开去，起到一定的语言保护作用。在获得另一种方言和语言的过程中，双言双语人也了解了另一种方言、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并具有了同另一方言区、另一语言社团的人进行语言沟通的能力。而且，双言双语现象具有相当强的稳固性，一些民族的双言双语现象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此，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可以兼顾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

既然如此，应该把培养双言双语人作为重要的语言政策。这既是现实语言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有法律根据。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对方言区来说，就是要造就双言人；对国内少数民族来说，就是要造就双语人。

我国在培养双言人和双语人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制订了若干有关的法规、条例，过去只是没有把它自觉地上升到语言政策的层面去认识，或者说没有用“语言政策”去对它进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应看到，过去培养双言双语人的主要目的在于语言沟通，而非语言保护。汉族人学习普通话是为了同其他方言区的人沟通，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是为了同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沟通，学习外语是为了同外国人沟通。这种观念是需要进行调整的。

3·3 抢救濒危语言

对于濒临消亡的汉语的土语和一些民族语言，应迅速进行抢救和保护。

加强母语教育把培养双言双语人作为语言国策, 便于提高培养双言双语人的自觉性, 便于统一全国上上下的认识, 便于政府主管部门制订各种具体的与国策配套的法规、条例和措施, 并对人事、教育等领域中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便于用政府行为来扫除各种思想障碍和社会障碍, 推进双言双语人的培养工作。

我国对语言文字工作是比较重视的, 几十年来制订了许多语言文字政策, 如推广普通话、语言文字规范化等。这些政策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发挥了并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旨在进行语言保护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很少, 应该加入并加强语言保护的政策与举措。

对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造成双重威胁。学习外国语, 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和国际合作, 但不能失去母语的根。现在,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在采取措施,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正在着手加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的母语教育工作。希望通过这些工作, 能“把根留住”。

1·2 语言沟通

汉语各方言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差异, “众星拱月”般地向普通话靠拢; 国内外各语言间的相互接触、相互渗透也日渐增多。不同地区、国内各民族和国内外的语言沟通, 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在中国, 方言间的隔阂和语言间的沟壑, 仍极大地妨碍着人们的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 大大小小的、或隐或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语言冲突和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因此, 在当今中国的语言生活中, 既需要考虑语言保护问题, 保护和开发各种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 繁衍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包括次文化), 保持其地域特色和民族属性, 又需要认真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

1·3 双言双语人

二、中国培养双言双语人所存在的若干问题

双言双语人古已有之。王健庵(1992)、喻遂生(1993)、金若(1993)等对《诗经》和两周金文韵文的研究表明, 起码在西周时代汉语已有方言存在。有方言和方言间的交际, 就必然有双言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起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开始, 语言是民族交往的先导, 因此, 起码在商代就有双语人存在。双言双语人历代不绝, 他们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流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清朝末年“同文馆”的设立和汹涌澎湃的国语运动的开展以来, 双言双语人才的培养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100年的历史中, 中国通过教育等方式培养了许多双言双语人。

50年代以来, 我国大陆在推广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等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 这些工作和成绩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关于我国培养双言双语人方面的成绩, 在政府的报告和许多论文论著中都已有所反映, 本文只打算讨论一下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觉得, 我国大陆在造就双言双语人方面还存在如下一些值得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2·1 大多数人还是单言单语人

只会讲一种方言的人可称为“单言人”；只会讲一种语言的人可称为“单语人”。一般说来，单言人一定是单语人，但是单语人不一定是单言人。现在，我国大多数人的语言生活仍然是单言单语式的。从地域分布上看，单言单语人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地区（民族杂居地区除外）；从社会分布上看，年龄较大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单言单语人的比例较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尚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青壮年文盲或半文盲，在贫穷落后地区还存在着少年儿童失学的现象，新的文盲和半文盲不断孳生。文盲和半文盲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单言单语人，这就意味着单言单语人还在大批量地产生。这种状况无疑会严重地影响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语言沟通。

2·2 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

任何方言和语言，在法律地位上应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是，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使用人口等方面的差异，而使得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在交际价值方面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一般说来，使用范围较广、交际价值较高的方言、语言是强势的；使用范围较窄、交际价值较低的方言、语言是弱势的。

就当前我国的语言状况情况来看，普通话是强势方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是地位较高的权威方言）；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语的使用范围较大，是中国诸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就世界范围来说，英语等一些大语种的使用范围较广，交际价值较高，是强势语言。能较好地掌握和使用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是“强势双言双语人”；没有掌握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或不能较好地掌握和使用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是“弱势双言双语人”。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之单言单语人在语言沟通方面稍有优势，但其优势远不如强势双言双语人。

在我国的双言双语人中，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许多双言人所掌握的方言中没有普通话这种强势方言，或者说的是方音特别重的“地方普通话”。许多操双语的少数民族成员，或者其双语中没有汉语，或者说的是某种弱势的汉语方言，或者说的是“地方普通话”。许多会说外语的中国人，其外语水平也相对较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用外语进行较为自如的全方位的交际，他们也是弱势双语人。

产生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例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二：

a、我国语言教育的范围和质量都还不够理想。大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开展了几十年，但是由于人口多，方言复杂，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粤语北上”的影响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能够讲普通话的人仍然集中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和某几个年龄段。外语教育的范围和条件比起普通话教育来就更为有限。

b、许多双言双语人一般都是“自然双言双语人”。自然双言双语人不是通过正规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二方言、第二语言的，而是由于迁徙、旅居、杂居或生活在双言双语环境中自然而然习得（Acquisition）的。由于我国的语言分布状况，自然习得普通话的机会并不多，如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即使掌握了汉语，也多是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汉语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南方方言区的人，自然习得的第二方言也多是南方的方言或带有较强南方味的地方普通话。

2·3 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应该承认,我国对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效果并不怎么理想,社会用于语言教育的投入、个人用于语言学习的投入都很大,但与产出却很不成比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伦内伯格(E. Lenneberg)、彭菲尔德(W. Penfield)等人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在年龄上有最佳期和临界期。查穆伯斯(J. K. Chambers)在《方言习得》(Dialect Acquisition)中把语言习得者分为“早期习得者”和“晚期习得者”,指出:早期习得者(7岁和7岁以下)可以顺利习得语言;晚期习得者(14岁和14岁以上)几乎不能顺利习得语言;7至14岁之间的人,有的属于早期习得者,有的属于晚期习得者。虽然语言学习的最佳期和临界期的年龄还有不同看法,但多数的研究认为,语言学习的最佳期在7岁左右,临界期在13岁左右。7岁之前可以较快地、地道地掌握任何一种口语;临界期以后再学习语言就比较困难,而且难以学得地道。

在我国大陆上,条件较好的城市学校多数是在小学五年级开始教外语,条件较差的乡镇学校多是在中学才开设外语课。学生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已接近临界期或在临界期之后,加上学生的外语成绩与升初中、升高中、甚至升大学(少数专业除外)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一般都收效不大。绝大多数人的外语其实是在大学或专门的外语教育机构学习的。学校的普通话教育状况比外语教育状况稍好一些,但是,使用方言和地方普通话进行教学的学校并不在少数,特别是乡镇学校和南方方言区的学校。许多学生在语言学习的临界期之前并未掌握普通话。

由于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造成了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全社会的普通话水平不高和外语水平低下的局面。语言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固然与教育条件(如师资条件等)有关,但主要是因在教育指导思想和语言教学等方面,忽视语言学习的规律,对造就强势双言双语人的意义缺乏自觉的认识。

2·4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语言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许多专家认为,语言教育中使用母语,可使个人充分发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得到保存和延续;而且,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交流与团结,而且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实行双语制,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当然,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要充分考虑到民族自己的愿望,既要防止“语言同化主义”,也要克服“语言封闭主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例如:

- a、在哪个年龄段,或者说在儿童的母语发展到何种水平时开始进行汉语教育最为合适?
- b、是否有可能在儿童语言学习的临界期前后完成最基本的双语教育(特别是口语教育)?
- c、母语与汉语在教学中如何分工与合作?比如,哪些课程适合用母语教学,哪些课程适合用汉语教学?

d、怎样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含量，提供较为充足的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母语和汉语的课外读物。

2·5 母语水平滑坡

三、对策思考

无论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还是从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着眼，都必须对如上所述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对策有许多，限于篇幅，只谈国策和研究两个方面：

3·1 把培养双言双语人作为重要的语言国策

3·2 深入研究

重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必须有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不能仅凭热情和轰轰烈烈的运动。“二简”方案的教训就在这里。当前，人们对双言双语的认识还相当有限，特别是从语言国策的高度对我国双言双语问题的研究，更为欠缺。我感到，需要研究的课题有如下一些：

- a、中国双言双语的历史考察。以史为鉴则明。
- b、中国双言双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这方面要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和实证性研究，制订对策要有宏观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作指导，要富有远见，要符合国情。
- c、双言双语教育的规律及教育改革。双言双语教育应遵从语言学习规律。语言学习规律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就各种类型的语言学习而言，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最为成功的，应加强对第一语言习得的研究，从中获取有益借鉴。
- d、双言双语人的心态与优势。
- e、大批量培养双言双语人的规划与措施。规划与措施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法律效力。

总之，语言是文化（和次文化）纵向传承的“基因”，是不同文化、次文化横向交融的梁津。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料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应加紧对我国方言和语言的调查研究，建立能保存方言和语言真实面貌的音档，设法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在现代科技、政治、经济等大背景下制订语言沟通战略，争取在不长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的强势双言双语人，以利于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中国迅速地走向现代化。

主要参考文献

- 陈恩泉等 1994 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
- 陈前瑞 1994 方言习得的八条原则——介绍 J. K. Chambers 的《方言习得》，《国外语言学》3 期。
-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0 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法规室 1995 语言文字工作百题，语文出版社。

- 金 若 1993 《诗经》韵系的时代分野, 《古汉语研究》4期。
-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眸 子 1997 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 《语文建设》1期。
- 孙宏开 1983 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 《民族研究》6期。
- 王健庵 1992 《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 《中国语文》3期。
- 邢福义等 1990 文化语言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 许嘉璐等 1996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严学宥 1985 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 语文出版社 1993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 语文出版社。
- 喻遂生 1993 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 《西南师大学报》2期。
- 周有光 1992 新语文的建设, 语文出版社。